

符号、书与知识分子

郑也夫

什么是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定义。如同以往的一切定义受到挑战一样，“人是符号动物”的命题也因人类正在教会猩猩手语而受到挑战。我们只好补充说，人是创造与运用符号的动物。知识分子是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因而他们最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及其文明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可记载的符号系统，使用它的知识分子，符号赖以呈现的“物质衬体”，三者间有着种种特定的历史关系，并共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动因。与纸草、泥板这些衬体相联系的是祭司阶层，与甲骨相联系的是巫士，与竹筒相联系的是史官，与纸相联系的是科举和书生。古代中国因找到和发明了更卓越的符号衬体，在书籍的种类数量上曾远远高于西方。近代西方文明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拼音文字的内在逻辑与活板印刷的密切关系导致了1450年后中西信息生产上的逆转。但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将获得新生。

作者：郑也夫，男，1950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人，创造与运用符号的动物

在人类的认知历史上，探索外界始终伴随着认识自我。尽管前者浩大无边，后者渺小有限，但在艰巨性与重要性上，对后者的认识从来都不逊色于前者。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道德经》），表达出这位哲人把认识自身放在了更高的层次上。苏格拉底说：“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他接下去又说：“不经反省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①这似乎也表明了他把探讨自身看得更为重要。

什么是自身，什么是明白自身？作为一个科学家，就是明白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是明白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人。而这个同心圆的核心是人，是人类。什么是人类，是我们在此首先要搞清楚。

以往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将人类视为“使用工具的动物”。本杰明·富兰克林（B. Franklin）发展了这一观点，将人类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以后这一观点风行一时。但是，在当代众多的动物学家们发现了灵长目动物使用工具的无数例证后，^②将人类定义为工具动物，已不再站得住脚。

取代“工具”定义的另一定义是“人是具有后天获得性的动物。”早期人类学家强调，

^①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申辩》17节、28节，参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参见：〔日〕西田利贞：《钓棒记略》，见于郑开洪、魏敦庸编《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日〕祖德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依赖于本能还是依赖于后天的学习，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分。爱德华·泰勒 (E.Tylor) 说，文化就是“后天获得的才能和习惯。”但是，不管本能怎样基本上决定了动物的行为，深入的研究却显示出后天的学习也有效地作用于动物。^①因此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本能固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人与动物行为的差别，两者间却不存在一条鸿沟。既不能单单地以“后天学习”来定义文化，也不能以之定义人。

二十世纪的学者倾向于为人类作出这样的一个新定义：人是符号动物。40年代初叶，两位学者提出了这个同样的命题。莱斯利·怀特 (Leslie White) 说：

1939年6月，为纪念“细胞是一切生命组织的基本单位”这一发现的100周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了一次庆祝会。今天(1940年——译者注)，我们则开始认识并正确估价这一事实：即符号是全部人类行为和文明的基本单位。

全部人类行为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正是符号才使得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转变为人类。仅仅是由于符号的使用，人类的全部文化才得以产生并流传不绝。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反之，符号行为是人类行为，符号乃是人类特有的领域。

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②

《人论》的作者卡西尔 (E.Cassirer) 说 (1944)：

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的本质的内在原则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的特征，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符号系统的原则，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③

这两位学者分享的另一共同认识是，在能否使用符号，也即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怀特说：

这两种类型的区别间存在着最重要的鸿沟。人类使用符号，其他动物则不能使用符号。一个生物有机体具有符号能力，或不具备这种能力，其间并不存在中间阶段。^④

卡西尔说：

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能确实地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

① 参见〔日〕祖父江孝男：《简明文化人类学》，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② 怀特：《文化科学》，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1—32页。

③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35、45页。

④ 怀特：《文化科学》，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4页。

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①

动物果真没有超越情感表达的语言吗？没有一套符号系统吗？怀特、卡西尔之后，动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昆虫学家们揭示出蜜蜂间的信息传递方式。但是进一步研究却又显示出，这种信息传递方式，是产生于本能的一种能力，不是后天创造或学到的交流系统。同时，尽管这一信息系统非常卓越，却也异常刻板机械，它既不能在与生俱来的功能上有所增添，也不能在信息传递的宽度上有所扩展。在这方面，它没有任何的灵活度和创造性。因而，也的确可以沿用卡西尔的术语，将之称为“信号”，而非“符号”。蜜蜂的信息系统的存在构不成对卡西尔和怀特理论的真正挑战。

真正的挑战来自人们对灵长目动物的研究。1966年加德纳(Gardner)夫妇训练一只出生6个月的雌猩猩华肖(Washoe)使用美国手式语，初次成功。其后几年中，多位学者成功地教会猩猩手式语。与这种经验尝试相一致的是，一些生理学家根据解剖学研究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大脑中是否有语言中枢（即运动性语言中枢，亦称布罗卡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亦称韦尔尼凯中枢），而黑猩猩的大脑中恰好存在着这种东西的萌芽，但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近三十年来动物学、生理学上的发展，使我们今天难于象怀特那样信心十足地认定符号只属于人类，人与动物间存在着鸿沟。而不得不思考，从低等动物到人类是一个系列谱，或许黑猩猩已经处在符号的门槛上了。那么，说到底，我们还可以坚持怀特与卡西尔的“人是符号动物”的定义吗？克劳福德(M.P.Crawford)对猩猩行为的实验研究结果，日本学者观察到的一个小海岛幸岛上几十只猴子的模仿行为等，^②都生动地说明了人类语言的重要性及其他灵长目动物在信息传达上仍然存在的巨大欠缺。而结合前述的人们已教会了几只黑猩猩手势语的实验，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猩猩已经有可能跟随人类学习一些符号的掌握与运用，但它们还绝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符号系统。正象当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把前人关于人的定义从“使用工具的动物”修改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学家的最新成果使我们有理由退后一步，把人的定义从“使用符号的动物”改为“创造和运用符号的动物”。“创造”在这里的含义是丰富和深刻的。它不仅指人类的符号系统是他自身发明的，并且人类成员的每一次最普通的语言使用，实际上都不是条件反射和单纯的模仿，而是一次创造性的组合。

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个符号系统，人们可以谈论那些并不直接发生于我们感官范围内的事情。猴子在五年内才完成的经验传递，人只要五天、五小时、甚至五分钟就可完结。动物，要么是缺乏一个健全的信息传递系统，要么是只具有一个比较僵化刻板的传递系统，因而它的世界是相对凝固的。而人类的世界在不断扩展。原因正在于我们拥有一个日益复杂的符号系统，我们把过去的经验带到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中，从而使得我们站到了“巨人的肩上”，使一个此刻的人具备了百代前人积累下的智慧。我们把未知的世界编入到我们的符号世界中，并去翻译、把握和预卜。因为经验的世界在一代代扩展，又因为未知的世界是永无止境的，因而人的世界也在永不停歇地更新。我们把我们的每一点新知迅速地传递给我们的同类，使得人类共同体更加智慧、强大和认同。而这一切均仰仗我们人类发明、创造和运用着的这个充满魔力的符号系统。

①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② 以上两个例证见于《简明文化人类学》第30、35—36页，〔日〕祖父江孝男主编：《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青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二、知识分子，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

我们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生存在这个星球上；其次才是作为一个小群体——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生活在社会中。因此在认识自身的过程中，继人类定义的讨论后，便轮到了知识分子定义的讨论。

何为知识分子？是否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论语》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种田种菜无知识可言。绝非如此。特别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农业是人类积累了大量知识后才确立的一种生存方式。农圃之术正是这一伟大文明形式的知识与技术的基础。可见不是老农老圃没有知识，而是并非掌握一切知识的人都可算作知识分子。严格地说，知识人人都有。就自然知识而言，每个劳动者都掌握一些生产技能，没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是无法从事任何一项简单的生产活动的。就社会知识而论，礼节、习俗、法律、规范是人人都通晓一二的，否则他就不能享受任何社会生活，不能从事任何社会交往，甚至不成其为一个社会的人。因此，知识分子与普通人的差别不在有无知识上，甚至不一定在知识的数量（孔子推崇的礼义知识，几乎很难与农圃知识作数量比较），而在知识的类型上。

是否可以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间区分的标志呢？可以说，很难找到一种脑力劳动不带有体力的支出，更没有一种体力劳动不含有脑力活动的成份。不错，凭借感觉大家似乎可以大致区分出这两个“标签”所标志的那两大职业范畴。但是这两个标签的字面含义却并未反映和揭示出这种差别的本质所在。

在第一节中，我们说：人类是创造和运用符号的动物。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说：**知识分子是使用某种特殊符号系统的人。**

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创造和使用其第一套符号系统——语言。正是凭借着它，人类在早期的生产生活中摸索到的大量经验，得以口口相传，从而融汇和积淀成代代相承的知识和传统。随着生产生活的进一步社会化与复杂化，口语的功能欠缺刺激着人们以另一种手段去填补它，于是文字——第一种可记录的符号系统渐渐产生了。有了文字才能记载下人们发生和认识到的一切，才能把指令不走样的传到远方，使统治建立在较大的地域上；才能把知识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使人类更牢固地站立在历史巨人的肩上。几乎在人类的每一个民族中，最初专门掌握文字的人，都因为握有一套特殊的“语言”，而成为显赫的阶层。他们也正是我们所说的最初的知识分子阶层。早期知识分子中固然也不乏一些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但当时知识阶层的主要社会职能是为社会提供规范（伦理与秩序）或从事管理，其主要符号象征系统是“文字”。而当时生产领域中的知识更多地掌握在农夫、工匠手中。这些知识仍停留在感性、经验的水平上，且仍然是口口相传。因此，如上所述，**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最初区分便不是有无知识，不是知识多少，而是知识类型；不是有无运用符号系统的能力，而是运用哪一种符号。文字，成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第一道分界线。**

随着人类的认知向大自然及自身思维的深度挺进，又形成了一套套新的符号系统：数学语言、力学语言、物理学语言、化学语言，二十世纪数理逻辑与电子学的结合又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电脑语言”（即计算机语言）。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伴随的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一大批掌握了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本领的知识人第一次进入了生产领域中。同时，

古老的艺术语言(音乐、美术等等)也不断丰富、发展、走向专业化。综上所述,精通文字、艺术、科学、技术等诸多符号系统的人们,构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与古代知识分子——文士阶层相比,当代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征是其内部异质性的激增。这种异质性的外在表现是知识子的职业从单一变为多样,而这种异质性的内因是多种新型符号系统的创生。

纵观知识、符号系统与知识阶层的发展变迁,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差别不仅在知识的数量即多少上,更在认知形式与符号形式的差别上。实际上,在人类认知的历史上,正是符号形式的一次次更新大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扩展和深入。在古代,符号形式的唯一差别是文字,在近现代,标准还表现为很多新的符号系统——自然科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等。在古代,掌握了文字系统的人几乎就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在当代,大多数人都掌握了文字,只有具备更高文字造诣和更多学科知识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的现象是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而人类的任何一种认知语言(无论口语、文字、数学公式、力学公式、计算机语言)都是有限的、抽象的。以有限把握无限,意味着要从具体和个别中得到抽象和一般。社会需要对于自然、社会的“一般性”作探究,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能力和条件去从事探究的。社会是分工的团体,尽管多数社会成员主要在为衣食住行的满足而劳动,探究大自然中“一般性”的成果却不同程度地造福于每一个人,对于全社会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要求多数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掌握一些“成果”。因此每个社会都要形成一些专门性“知识”职业和“知识”团体去从事知识活动,还要组成一种生产知识分子的机构(即学校一类的组织)去保证“知识”人才源源不断地产生,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甚至在最原始的、少差异的、分工性很弱的社会中,也往往设置一些专门从事占卜、史记、艺术的职位。在分工性更强的社会中,更需要设置多种具有专门知识的角色和团体组织,去帮助现存的政权建立威信,去解释古今历史,去阐明人类在自然和宇宙中的位置,去控制罪恶以维持社会的平安,去向年轻人教授传统以及礼仪、习俗、道德,去或多或少地帮助人们控制自然、驾驭物质资源、发展生产。

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知识活动达到了不同程度的组织化、社会化。在这种组织化、社会化的过程中,知识阶层使用的共同“语言”渐趋规范化。正如韦伯(M. Weber)所说:科学成了一种职业,追求知识已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了,而是职业的要求,社会的要求。^①默顿(R. Merton)说得更透彻:科学已是一个组织,扩张可被证实的知识是科学的“组织化、制度化”了的目标。在这种组织中,大家共享一种价值和标准,因而大家的知识和研究也更规范化。组织还设有奖励“制度”,去刺激科学家们。^②科学如此,教育更不待言。正是在这种组织和制度的作用下,“知识的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使得我们有可能以某种学历或是某些职业,为知识分子下一个可操作的、可进行定量分析的定义。但是因为人类的知识不断积累,符号系统不断更新,教育日益普及,学历渐趋长高,所以这种操作定义也将随之变化。比如,我们可以把隋唐以后有科举功名的人定义为那时的知识分子,可以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定义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未来知识分子的操作定义却必然随未来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但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知识水平上的分层总是存在的,知识水平高的阶层对社会的特殊功能(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行使的功能并不一致)也总是存在。

^① “Science as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pp.134—156,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W. Mills, London, 1958.

^② Robert Merto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1973, Chapter 3—5.

因此知识分子阶层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仍将存在。

当代知识分子群体之庞大,知识活动种类之繁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人类文化发展所发挥功能的不同,要求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区分。我们以为,从知识活动的性质上,至少可以把知识分子分为两大类型:传播与应用型知识分子和创造型的知识分子。

传播与应用型知识分子,虽直接从事于知识活动,与某种符号系统密切相关,但他们基本上不是创造,而是传播和应用现有的知识。教师、编辑、记者、普及读物的作者,基本上属于“传播型”知识分子。而工程师、临床医生、地质勘探者及很多应用科学的工作者,基本上属于“应用型”知识分子。

创造型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少数人,但他们对符号系统的创新与完善的贡献却是巨大的。这类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学者、部分作家等等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产生作出了贡献的人。需要补充的是:以上种种知识职业与知识分子的这两种类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绝对的。它只是就“理想型”的意义而言的,并不是说现实中每个占据了科学家职位的人在科学上都有所创新。

以上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都是从事文化工作,即直接与某种特殊的符号系统所承载的某种专门知识打交道,因此他们是更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除此,还有另一部分人,他们受过大专以上的正规教育,即受过某种符号系统的训练,但以后不从事文化工作,而从事管理和行政工作。若取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这批人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已不再亲身加入到某一特殊的符号系统中,已离开知识与文化的工作。但若取广义的知识分子定义,他们仍算知识分子。因为早年所受的正规高等教育,毕竟使他们在纯粹认知的意义(不考虑官僚组织的原则和该组织内的角色要求)上与文化型知识分子保有一定的共性。虽然已离开文化工作,他们在文化水准上也毕竟比未达到高等文化程度的人更接近于文化型知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因离开了知识与文化性工作,因长期服从于另一种规则,他们也毕竟与文化型知识分子有了很多差异。笔者倾向于称这一群体为“非文化型知识分子”。

以上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与特殊符号系统的关系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创造型知识分子处在某一特殊符号系统的圆心,他们不断为该系统创发出新的内容。在他们的直接外围是传播与应用型知识分子,他们把处在符号系统核心的知识创造者的创新传播到社会,或将这些抽象的符号成果应用到为全社会服务的实践中。在传播与应用型知识分子的外围,特别是传播型知识分子的外围,是非文化型知识分子,他们早年曾沐浴在知识传统中,因而对知识系统有一定的理解。在他们之外,则是既未受到系统的符号训练,也不从事知识文化工作的人们。

符号系统当然只是全部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围绕符号的分层也只是全部社会分层中的一个维度。社会还有其权力系统,权力系统也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与分层安排。而这两大系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也自然有其相同相异的种种关系形式。每一方也都当然地受到另一方的影响。

三、书籍,符号的载体

人类的第一套符号系统——口语,具有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它是最便利的交流手段,另一方面,它留不下任何痕迹。正是这后一特征构成了极大的脆弱性。没有人知道原始人,甚至古人的口语是什么风格。正因为这样,语言的起源几乎成了一门绝学。无论古文字如何深奥难

解，我们仍可期待学者们去破译。但语言的起源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没有任何风影可以捕捉。关于它的任何讨论都只是大胆的梦想和假说。以至在本世纪初巴黎语言学会明文规定，在它所举办的一切会议上，拒绝接受谈论语言起源的论文。

语言起源说不清了也便作罢，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更大的遗憾是很多种语言已经死去。而一个民族的全部经验和知识都是同其语言融汇在一起的。语言死去了，没有留下痕迹，那笔积累在语言中的遗产也便断送了。

因此，语言及它所传递的经验、知识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它的记载形式。这一形式的诞生和发展依赖于三个条件。第一，符号系统上的创新，即创造出记录语言的文字。第二，因文字系统在初创时的复杂与艰巨，需要少数专门的知识分子去从事它，对此我们在上节已作论述。但是除此，还有一个文化研究者很少专注，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要素，就是文字符号的每一次问世，都必须有一个它赖以依存的有形的、物质的“衬体”。

人类找到的第一个衬体是原始人洞穴中的石壁，在这上面人类写下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壁画。尽管这并不是纯粹的符号系统，但以后书写符号的产生及发展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原始人走出洞穴，特别是随着文字类符号系统的产生，人类开始多方寻找文字符号赖以呈现的衬体。

根据考古学发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上的苏美尔人已经在泥板上刻写他们的楔形文字。

尼罗河畔的古埃及第一王朝(公元前3000年)的人们已经用产于该地的纸莎草书写文献。而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在商朝后期(公元前1300年)开始在龟甲与牛肩胛骨(因这些骨头成片状)上刻写文字，因而这种古文字被今人称为甲骨文。^①

在东西方的世界中，石刻也都曾经是文字的衬体。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石碑是近东最早的石刻。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是春秋战国之交的石鼓，上面曾刻有600余字的诗文。几乎与甲骨同时作为文字衬体的还有当时作为礼器的青铜制品。其文字称为“金文”。金文持续的历史比甲骨文更久。商代的文字主要以甲骨文为代表，而西周到春秋的主要文字是金文。

以后取代甲骨与青铜器，成为中国古文字载体的是竹简。据古文字专家认为，商代已有了竹简。从周朝，特别在春秋战国和两汉时代(虽然纸在西汉时代已发明出来)，竹简成了最大的文字衬体。因为竹简在廉价易得(找不到竹子的地方有时以木简代之)上是甲骨、青铜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商周的贵族文化是凭竹简走到平民手中的，中国浩瀚的古代文献是借竹简而流传于世的。

除了上述这些衬体，还有一些更贵重的质料。在西方是羊皮纸，在中国是丝织品构成的帛书。因为在西方的世界中迟迟找不到廉价的衬体，在中世纪的教会中多以羊皮纸代替了古代的泥板、纸草。而在中国因为廉价的竹简的问世及不久以后纸的发明，帛书只是文字衬体族类中匆匆逝去的贵客。

从人类对于文字衬体的长期寻求的历史中，我们至少可以发见这样几个重要事实。

^① 此外，据考古发现，中国人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已有刻在陶器上的象形文字符号。见于丁守和主编：《中华文化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1. 几乎每一种衬体都与一个特定的知识阶层,甚至一种文化相联系。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畔与泥板和草纸相联系的是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因为甲骨文的最初职能是预卜部落及国家大事,甲骨上的多数文字是卜辞,因此与之相联系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巫”,也即“卜人”、“贞人”。而与竹简相联系的是“巫”之后或与之同期的另一类知识分子角色“史”,也即史官。“册”在象形文字的字源上无疑与竹简关系密切。商周两代的史官官名为“作册”,揭示出史官与竹简的关系。

2. 史籍之浩瀚,史官文化的发达,是中国早期文明中世俗文化早熟的重要特征。我们至少可以说,廉价的竹简充当文字衬体,是这一文明得以勃发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一衬体的领先,中国的文字作品的丰富程度远胜于同期的西方,中国的文化也开始领先于西方。

3. 随着文字符号的发明,人类开始苦苦地寻找它赖以存身的衬体。泥土(泥板)、石头(石刻)、动物(龟甲、牛骨及羊皮)、植物(纸莎草、竹简、木简)、金属(青铜器)、丝织品(帛书),他几乎寻遍可以找到的一切质料。从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中文字泥板的问世,至西汉时代中国人仍使用的“汗牛充栋”的竹简,三千多年中人类没有找到承载文字符号的如意衬体。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纸张是文明史上划时代发明,它堪与人类的一切最伟大的创造媲美。纸的发明的象征年代是公元105年。这一年蔡伦向东汉和帝上奏纸的发明。其实这一发明有其渐进的过程。我们很难说哪一形态是其定型,更难确定其时间。

现代人为“书”所下的定义是:它是手写或印刷的,具有相当长度的,用于传播的信息材料。只有当文字符号找到了恰当载体时才形成了“书”。就功能而言,欧洲古代和中世纪的羊皮纸书卷与中国古代的竹简,都是“书”。然而前者的稀少难于普及,后者的笨重不易携带,都制约了书的传播功能。纸是奇妙的发明,它轻薄、柔韧、廉价。纸成了符号的衬体与载体,正象黄金作为货币一样恰当。从纸的问世至今近2000年了,我们仍看不到有更优越的材料替代它。

我们说,书写符号,其衬体,其使用者,是文化传递与发展的三要素。而前两者的结合也决定了第三者的某些特征。文字与甲骨的结合造就了“巫”、“卜”的社会角色,文字与竹简的结合造就了“史”的社会角色。而文字与纸的长久的联姻,更给予知识分子一个最通俗流行的名称“读书人”、“书生”。

中华文明起于夏商,奠基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唐。正是以竹简为载体,中国文化得以从西周贵族手中普及于下层士人,从而勃发光大,最终迎来汉代的繁荣。纸虽发明于西汉,它完全取代竹简却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到魏晋时普及。以后天下大乱。只是在隋唐重新带来太平一统时,我们才发现,纸成了一个重大社会选择——科举制——的前提,从而将中华文明推上新的高峰。是纸的普及使得遍及全国的私塾——科举的预备场所——中的万千学子有了必备的教本和经典,保证了知识进一步走出贵族的门阀。唐宋时期的中国社会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创造出全世界最丰富的图书储备。麦克格雷说:“古腾堡(1450年)以前的若干世纪中,欧洲大约有30000种图书。”^①而仅纸张普及后的魏晋唐宋四代,据半个多世纪前的不完全的粗略统计,中国人就写出了3万部书籍。^②若比较同时期的抄件、复

① K·J·麦克格雷:《信息环境的演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

② 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新中华》杂志,复刊第四卷七期,民国三十五年。

本，中国书籍信息的优势将更为巨大。不能不说这些成就与纸的发明关系密切。中国古代文明曾领先于同期世界，原因不止一端。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等方面比较中西文明自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鲜为学者们论及的是：古代中国文字载体——从竹简到纸的领先，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居于世界前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公元757年居住在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从抓获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造纸的秘密，1150年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又将其再传给西班牙征服者。从此纸张逐渐成了全人类文字符号的载体。

书是用来储备和传递信息的。书找到了纸张作它的最佳载体后，抄写就成为增加复本以扩大传递的“瓶颈”。中国人使用纸张早于阿拉伯人七百年，早于欧洲人一千年，因此中国人最先想到并开始了印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早的雕板印刷始于何时？正如中国印刷术研究家卡特（T.F.Carter）所说：“这个问题仍隐蔽在神秘之中。”但据他判断印刷术发明的“最近的年代，大致当在唐玄宗时（公元712—756），正是中国国势最盛，文化发展登峰造极的时间。”^①虽然雕板的最初发明正象石刻一样，带有勘定经文、避免误传的性质，所以未刻在石头上，只是“因为府库空竭。”^②但很快雕板印刷的动力就转移到增加复本扩大传递以至商业性的动机上了。在宋代，雕板印刷已精美完备，规模浩大。雕板印刷术的发明进一步保持了古代中国业已获得的文化领先地位。且正在宋代初年的庆历年间（1041—1049），雕板印刷蒸蒸日上之时，毕升摸索到了活版印刷的门径。

但是令人惊异的是，从竹简、纸张、雕板印刷，一直节节领先于世界的中国文字载体，竟在毕升对活字版印刷的尚不完满的发明前止步。我们久等了400年，直到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他的活字版印刷术（1448年），西方的信息手段冲破了抄写的“瓶颈”，与日俱增。我们又等了400年，直到19世纪初叶西方的传教士前来教授我们近代活字印刷术。从古腾堡发明印刷术到19世纪初叶西方的教士敲打中国的大门，这期间西方人出版了325万种书籍。^③我们明清两代（明代始于1368年）在接受西洋传授的印刷术之前所出版的书籍至多只有10万册。^④中国的图书业大大地落后于西方了。这种差距的形成固然不仅仅由于古腾堡的发明，但它无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古腾堡的发明是否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影响或启发，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上述的那位严肃的西方学者认为：“我们不能作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其量所能说的是：纸张确实是由中国传入；关于中国雕板印刷对欧洲的影响，我们有强有力的物证可以合理地加以接受；至于中国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是否影响及于欧洲的印刷，现在还没有发现可靠的证据。”^⑤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者，恐怕另一个问题是更需要搞清的，那就是我们在竹简、造纸、雕板印刷，以至尚欠完备的活字版印刷上都曾遥遥领先，为什么我们的活字版最终只是古代印刷术中的一个点缀？

以往的学者们大致提出了下述几点认识：

1. 中国人过于重视书法美，雕板可拣选喜欢的字体，喜欢的雕工，活字版在这方面无

①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③ K·J·麦克斯格雷：《信息环境的演变》，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④ 杨家骆：《中国古今著作名数之统计》，《新中华杂志》，复刊第四卷，民国三十五年。

⑤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06页。

法与雕板相比。

2. 当时的工匠刻板已相当熟练，“下笔如飞”。
3. 中国传统墨只适于木板，不适于金属版。
4. 活字版投资太大，只能靠政府支持，不适于私人商人经营。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宋代以后书法的精美已大为下降，却并未因此为活字版提供机会。如果我们对活字版有足够的动力，几百年间“墨”的问题不会成为障碍。活字版印刷的投资决非政府无力负担。

我们以为，几百年来，没有打通这一途经的原因不是审美，不是技术，不是缺乏一次性投资。原因是异常简单的，那就是以中国实践者的才智足以作出这种判断：我们的文字系统的特征决定了活字版并不比雕板经济。

雕板只需要一些技法熟练的雕工就足够了，每人一块板、一把刀，把写好的薄纸贴在板上，一次刻成，不须检查、更正，还可随时重印。

而活字排版过程：第一，要建立一个字模排列系统，排字工既要认字（意味着他是读书人），又要熟悉这个排列系统；第二，排版后要校对；第三，印完后要拆开活字，回归原处；第四，要不断刻字以补磨损；第五，重印还要再排。

即使在近代我们接受了西方传入的活字版印刷技术后，据说，我们的20个排字工的效率只及西方拼音文字的一个排字工。实际上我们现代排字工的平均效率比古代雕板工的效率也并不高许多，何况毕升的时代。这是一本可以算清的帐，只须记住那时的刻工速度是相当熟练的。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假设我们使用的是拼音文字，面对毕升的发明与雕板印刷，我们会永远固守后者，而不去发展毕升的发明吗？那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我们说，活字印刷是拼音文字的逻辑产物，雕板曾经对象形文字更为经济。我们已有的成就（比如雕板印刷）对于一个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踏上新途，已经是足够的诱因了。而我们文字的固有特征，却使我们在书籍印刷技术的发展过程的一个关键处陷入困境。图书出版技术上中西优势的由此转移，并不是世界历史中中西文明重心转移的全部原因，却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一论断的最终证实，还有待于我们能否对更多的文化特例作出解释。

从古腾堡更先进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我们就遭遇了挑战。即使我们效法了人家的近代印刷术，仍然没有摆脱排字效率不如拼音文字的困境。

我们曾经数度以自己的成就诱发西方世界的崛起。今天西方的成就——计算机，也终于诱发我们找到了出路。今天，在理论上，汉字的输入与排版已可望赶上和超过西方了。不错，在当今的世界上，书籍与信息的丰产取决于更为多样的条件和因素。它更依赖于“瓶子”的容积，而不仅仅是“瓶颈”的扩展。但是计算机与汉字的结合所蕴藏的潜力一旦充分发掘，必将给古老的汉字和中国的知识人带来新生。

责任编辑：张宛丽